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对日本的影响

严清华

一、影响的悠久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隔不远。文化交流上源远流长，由来已久。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算起，两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开始进行交流活动。不过，当时尚属一般的往来活动，还谈不上思想上的互相影响。中国对日本在思想上发生影响，是在中国典籍较多传入日本之后的事。中国典籍最早传入日本，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之时。但较多的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则是从公元7世纪开始的。因为自此时起，日本朝廷开始派遣使者到中国来，当时中国的有些典籍就是通过返日使者带至日本的。同时，自此以后，中国对日本的学术交流日益活跃，许多中国典籍通过学者、学问僧、留学生之手传到日本。到江户时代（1603~1867），中国典籍已大量传入日本。据日本学者大庭脩先生研究，正德二年（1712年）仅中国的40号南京船一次就运去汉籍82籍^①。据说，文政九年（1826）乘“得泰号”抵骏河下吉田的清人朱柳桥曾与日人野田笛浦做过如下一段笔谈：“笛浦：‘贵邦载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夏虫之见者多矣！’朱柳桥：‘我邦典籍虽富，逐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②从这段笔谈来看，当时日本学者已知道中国的典籍相当丰富，中国典籍也已大部分传至日本。

正是在中国典籍源源传入日本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逐渐开始对日本发生

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一样，深深蕴藏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之中。大致与中国古代典籍开始较多传入日本的公元7世纪同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开始对日本发生明显的影响。作为其例证，可举出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的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宪法十七条》。这部法典就是在参阅了大量中国典籍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其中被直接、间接采用过的中国典籍，据日本学者举例，有《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孝经》、《左传》、《礼记》、《管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汉书》、《文选》等^③。从内容上看，《宪法十七条》受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影响的痕迹已相当明显（分析详后）。此后，经过大化改新，直至江户时代，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的影响，由朝廷而民间，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到社会伦理道德风尚，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深远。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所以东渡扶桑，在日本发生深远的影响，主要由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先进于日本古代管理思想。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之际，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即已开始推广使用铁制农具，工商业已相当活跃，学术上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诸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而这时的日本，尚处于以石器为生产工具，以狩猎采

集为生活方式的原始公社时代。其管理之落后就自不待言了。我国秦始皇统一天下是公元前221年的事,而日本直到公元5世纪才由大和国实现国家的统一,晚于中国六七世纪。其管理统一国家的经验自然远不及中国丰富。我国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从公元前5世纪之际开始的,而日本则直到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晚了中国十来个世纪。如何对封建国家进行管理,日本的经验也远不及中国。管理思想的记述与流传,要以文字的出现为契机,并以文献资料的存留为依据。中国约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后期就有甲骨文、金文等汉字的出现,而日本则至公元5世纪中叶后才开始使用源自中国的汉字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字;中国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文献资料就已大量存在,而日本则至公元8世纪才出现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均晚于中国十几个世纪。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大大先进于日本古代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面。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发生影响,同时也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适应日本的民族心理和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在古代,日本人自与中国交往之后,就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乃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蕞尔小国,“总感到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世界帝国的压力之下”^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使日本民族逐渐形成了奋进自强的精神、谨慎务实的性格和虚心好学的文化心态。作为落后小国,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没有心理“包袱”可言,无所顾忌,故对外国先进文化不抱成见,来者不拒。日本文化的形成,起初完全是汉文化输入的结果。因而日本人接受中国古代文明、吸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同时,中国

古代管理思想,随着中国各种典籍的传入日本,随着中国文化在日本影响的扩大与加深,也必然或大或小、直接或间接、有形无形地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因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发生深远的影响,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也可以叫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吧!

二、日本各历史时期所受中国管理思想影响的基本情形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古代,思想上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学。儒学中的管理思想,无论对于日本古代的管理体制,还是日本古代的管理思想,所发生的影响都相当明显与突出。

日本古代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经过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而这两次改革就基本上是以中国当时的管理体制为楷模和以儒家管理思想为指导而展开的。圣德太子改革亦称推古朝改革,是圣德太子仿效中国推行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作为这次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是于公元604年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宪法十七条》既是一部古典法规,也用一份用以指导统治者治国理民的管理纲要。它基本上是以儒家管理思想为指导而制定的。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强调以伦理道德为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属于伦理型管理思想。《宪法十七条》中即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而且其中有些条款和语句就直接出自或源于中国儒家典籍。如关于管理者权威,《宪法十七条》强调:“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显然源于《孟子·万章上》:“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和《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管理者的职责、行为道德规范与要求,《宪法十七条》规定:“诸任官者,同知职掌”,“人各有任,掌宜不滥”,“早朝晏退”,“赏罚必当”,

“勿斂百姓”，“使民以时”等，其中“人各有任”方面的内容源自《左传》“人各有以事君”（襄公二十八年）和《周礼》中的有关记述，“早朝晏退”源自《礼记·礼器》，“勿斂百姓”源自儒家“轻徭薄赋”的有关论述，“使民以时”则直接出自《论语·学而》。关于管理手段，《宪法十七条》十分强调发挥“忠”、“礼”、“信”等伦理道德的作用。指出：“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群卿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信是义本，每事有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⑤这些条文，简直如同出自中国儒者之手，表明所受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多么的明显与突出。继圣德太子改革40余年之后，日本又出现了一次大的改革运动，史称大化改新。这是一次以废除奴隶制、建立封建制为宗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是在留唐归日的“国博士”僧旻、高向玄理的咨询、参与下进行的，改革的目标基本上是要建立类似唐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因此，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制度、管理体制和管理思想发生影响的直接结果。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是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确立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经济管理形式，以及以法治安邦的管理方略。因而从内容上看也基本上未超出中国古代管理体制和管理思想的范围。上述两次改革之后，日本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就大体上建立起来了。而这一过程中，从上述内容来看，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策依据与理论指导的作用，其影响是相当之大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与突出。自我国唐代教育制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在教育管理上基本上以唐代为典范，在教育内容上也基本上以中国典籍为教材，尤其儒家经典，更是成为

士大夫的必读书。日本古代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及其统治者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他们的思想必然要受到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管理思想也必然要受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尤其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如江户时代思想家藤原惺窝（1561~1619）受到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就较突出。藤原曾被延为江户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之师，为其讲授《论语》、《中庸》、《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等书，他特别强调为政者管理的真谛，应遵循《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并撰著《大学要略》，阐述自己的见解^⑥。显然，他所接受的是儒家的管理思想。藤原乃朱子学的倡导者，他受到儒家管理思想的强烈影响，可谓自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古代也有朱子学的反对者，这些人在思想上受到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也较明显与突出。如江户时代古文辞派的创始者荻生徂徕（1666~1728）即是如此。他从方法论上批判藤原等倡导的朱子学，否定后世儒者对儒家经典所作的形而上学的解释。比起着重强调以伦常道德为管理手段的朱子学来，他更为强调从经济上确立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针对当时日本武士大量移居都市，农民“脱农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他主张实行“安民”之策。而所谓“安民”之策，从其有关论述来看，实际上也是以儒家管理思想为指导的。他说：“夫先王之道，莫大于仁焉。仁也者，养之道也，以安民为大焉。”“今礼乐虽亡，六经具在。苟能知先王之道为安民之道，知道无内外，而一意从事六经，习之久，与之化，则德立而民可得而安矣。”^⑦可见，他的理论依据，也是“先王之道”，也是儒家经典。日本在江户时代，由于对儒家经典所作解释上存在着分歧意见，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但无论哪个学派，都认为只有自己对儒家经

典的解释才是正确的,都视自己的学派为正宗儒学。这一现象,也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古代管理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反映封建统治者要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不能继续为其所直接使用;与此同时,西学东渐,西方学术思想逐渐风靡日本,日本思想界普遍认识到西洋近代学说先进于中国古代思想,于是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兴趣逐渐有所减弱。但中国管理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也仍未消失。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涩泽荣一的思想中得到有力的印证。涩泽荣一(1840~193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他的思想被视为是以儒学、尤其是以《论语》为中心的,其基本特点是将《论语》中的有关思想运用于近代企业经营管理之中,他的经营学说被称为“论语算盘说”^⑧。1909年涩泽70岁生日时,日本一位80岁高龄的汉学家三岛中洲先生在一幅画有《论语》与算盘的祝寿图上将其经营学说概括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⑨。据说,当时信奉《论语》的实业家,除他而外还有许多,而无意识地以《论语》为规范者在日本实业界更是占居大多数^⑩。这一现象说明,尽管日本近代面临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其仍有影响作用。

当代日本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强国,其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均已相当先进,但他们仍未忽视对曾对他们国家发生过深远影响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加以研究与利用。这方面的例子,前几年我国报刊书籍中屡有所见。例如,日本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过程中,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视为两大“支柱”或“车轮”之一,另一“支柱”或“车轮”为美国的科学管理;日本不少学者、专家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了专门研究,甚至连古典

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也不放过,从中寻找可资借鉴的东西。我国一个企业管理考察团访问日本,要求其介绍企业管理经验,日本朋友说他们的经验来自中国,并赠书一本,为《孙子兵法》。日本有的企业把书中的理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指导思想,日本某一大公司甚至还以《孙子兵法》为教材,对中层以上干部进行轮训。以上例子说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当代日本仍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影响日本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既有宏观方面的,也有微观方面的,还有间接性的。

关于宏观方面,可列出以下几个突出表现:

(1) 干预性较强的宏观管理体制。日本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历来就有干预性较强的特点。明治维新前日本封建社会幕府集权的管理体制自不必说;明治维新后,日本也一直通过国家干预来谋求经济的迅速发展;即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虽在管理方式上有较大改进,即运用直接的行政手段逐渐减弱,但国家干预经济的总体方针仍与从前一脉相承。日本采用干预性较强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文化意识上看,与日本自古以来基于儒家“忠”、“信”思想上形成的传统国家观是不无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基本上受中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影响的结果。

(2) 维护伦常秩序的社会管理意识。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了维护以等级制为特征的封建统治秩序,主张在人际关系方面确立与人们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伦常规范。如孟轲就主张“教以人伦”^⑪,提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⑫,要求做到“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⑧。受儒家这方面思想的影响，日本古代社会也有“大义名分”^⑨之说。江户时代思想家林罗山（1583~1657）更是明确指出：“尧舜设司徒之官，曰人伦之教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谓之五典，又谓之五达道，古今不易之道也。”^⑩所受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3）坚持“东洋精神”的开放管理政策。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全面推行开放管理政策，但也并未丢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是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响亮地提出了“和魂洋才”，“东洋精神，西洋技术”的口号。所谓“东洋精神”，其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尤其是儒家管理思想。日本幕末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曾赋汉诗一首，其中有“东洋道德西洋艺”^⑪之句。日本幕末另一思想家横井小楠（1809~1869）所提口号更为明确，叫做：“尧舜孔子之道，西洋器械之术”^⑫。可见，这时日本在对外推行“文明开放”管理政策中，仍念念不忘坚持儒教精神，表明其涉外管理思想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

（4）其他几个管理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有关管理国民经济的有些指导思想，在日本也可找到其踪影。如关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关系的义利论，日本古代就有反映幕府统治者利益的“交五伦，去私欲”^⑬的说法，这一说法显然系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翻版。中国古代有“义利两有”^⑭的观点，日本近代也有“义利两全”^⑮的主张，尽管二者在具体含义上有所区别，但在说法上则如出一口。又如关于如何看待农业与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本末论，日本古代也有不少思想家论及。如江户晚期思想家二宫

尊德（1787~1856）即有“农为国本”^⑯之说，江户前期思想家荻生徂徕也说：“重本抑末，是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⑰与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说法别无二致。再如关于消费管理问题上的奢侈论，日本古代也有类似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说法。如江户时代思想家贝原益轩（1630~1714）即云：“古明君贤主，无不俭约。俭，诚君之美德也。”^⑱二宫尊德亦云：“无论多么富贵，均应将节俭定为家法，严禁骄奢之事。夫奢侈，不德之源，灭亡之基也。何如？欲奢侈，恐贪利之念增，慈善之心薄，自然之欲深，以至陷于吝啬，与夫不知不觉而行不正之业，而生灾祸矣。”^⑲总之，在有关国民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方面，日本思想界受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影响之处也较多。

在微观方面，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也有一些突出的表现：

（1）集团主义经营精神。中国儒家注重群体效益，强调集体的力量。如荀况即主张“有群”，认为依据正确原则组成的群体可以达到“和”的境界，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⑳与儒家这方面思想的影响有关，日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逐渐形成了集团主义经营精神。日本的集团主义经营，起初也叫“经营家族主义”，基本内容是把企业视为一个大家庭的共同体，经营者被视为“家长”，一般职工被视为大家庭的成员，无论经营者还是一般职工均“视厂如家”。这种经营方式与思想，通常被以“企业一家”、“家族性经营”、“温情主义”^㉑等相称。在日本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经营家族主义与日本现代科学管理方式相结合，凝结成集团主义经营精神，成为主宰日本现代企业经营活动的“心魂”^㉒。

（2）“和为贵”的企业内部管理原则。“和为贵”一语，出自《论语·学而》：

“礼之用，和为贵。”此语被原封不动地搬至日本，并被运用于企业管理之中。日本许多企业均对“和为贵”大加宣传与提倡，有的工厂将之作为标语书写出来。与实行这一管理原则相联系，日本企业在现代化管理中实行了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度，这三者构成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三大支柱，是日本企业经营取得成功的重要“诀窍”。

(3) 兵法式的经营谋略。中国古代兵法大家颇多，军事谋略思想较为丰富。尤其《孙子兵法》一书，更是闻名世界，为外国管理者所推崇。该书中的许多思想被运用于日本古代的军事争斗之中自不必说，即令在当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也被予以借鉴。如《谋攻篇》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一语，即被经营者用作告诫自己注意掌握企业内外情况，以采取适当措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口头禅。《势篇》中的“出奇制胜”，被理解为在竞争中要运用奇特手段，出人意料，取得成功。《势篇》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有的日本企业经营者从这段话中受到启发，感到企业所用原材料就那么几种，只要善“变”，就可花样翻新，制造出各式各样适销对路的产品。可见，日本是很善于运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服务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还有一些间接性的内容。这主要指日本从经营管理角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与借鉴。古典小说是古人的文学作品，它本身并不是阐述管理思想的著作，也不能作为记载管理思想史实的文献资料来看待；但却可以从经营管理角度加以研究和利用，以便从中吸取滋养，寻找借鉴，获得启示。我们将这方面的内容称为间接性内容。日本对中国古典小说

的研究与借鉴，可以《三国演义》为例予以说明。在日本企业界，不少人对《三国演义》推崇备至，视为珍品，尤其推崇书中所述审时度势，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等谋略思想。一位大学教授曾指出：“诸葛亮的机智多谋，给日本企业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松下电器公司的显赫成功，正是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战略眼光的结果。”日本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郎也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的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三国演义》中应付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当一个好的企业家，如同当一个明君一样，必须对外宽，对内明，以明补宽，以宽补明。”^②日本对中国古代间接管理思想的借鉴，由此可见一斑。

四、日本吸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反映出的几个明显特点

(1) 开放性。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作为基本国策而言，推行的是锁国政策，但在文化交流上却基本上持开放态度，并主要从中国吸取文化滋养，故吸收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全面推行开放政策，主要是从西方寻找先进理论，故传播的大多是西方的经济学说。日本无论古代、近代和当代，均未形成完全由自己创建的经济管理理论，但却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风格。即持“拿来主义”的态度，放眼世界，立足本国，见有称心如意的理论，就一“拿”了之。在“拿”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并不厚此薄彼，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故日本的经济管理理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很难认定仅仅是对某一独特管理理论的搬用或复制，而其中往往或多或少、若明若暗、直接间接地夹带有其他管理思想的印迹。广泛吸收外国各种管理思想，正表明了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性特点。

(2) 实用性。日本人对待外国的各种管理思想，所持的是拿来主义的态度；而

“拿来”之后,在使用的时候,所采取的则是实用性的方针。他们对待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例如,对于儒家管理思想,他们就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的。日本学者尾形裕康即将儒教作为“实践道德学说”来看待,指出:“儒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实践道德学说。”^②日本人对待儒家管理思想是如此,对待中国其他有关思想或典籍也是如此。如日本现代企业集团创始人鲇川义介,生前酷爱研读中国史书《十八史略》,他即完全是以实用眼光来看待该书的。当有友人问他书中出现了多少位人物时,他随即答道:“共有4517位,这些人个个性格不一。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所探讨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等理论,都可在此找到实证。”^③在日本学者和企业家眼里,中国的许多典籍,大都可以从中找到现代经营管理的实用性例证。因而他们对中国的各种典籍均十分重视,对于其中的管理思想,只要能为其所用,无论主要的、次要的,系统的、零碎的,直接的、间接的,都决不放过,尽量予以吸收和借鉴。所体现的实用性特点,十分明显与突出。

(3) 民族性。日本人在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吸收和借鉴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结合本民族的特点,使之予以“日本化”。圣德太子改革基本上是仿效当时中国的典章制度进行的,但据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称:他却“划清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则和他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区别界限,小心翼翼地验证他们的精神是否适合日本”,“他并非想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④。圣德太子的这一态度,在日本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正是由于他们注重将中国历史上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与他们的民族精神相“嫁接”,因而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不是囫囵吞枣,盲目奉行,而是经过慎重选择,经过一番咀嚼与消化,使之适应日本民族需要的加工过程的。日本人对待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持的这方面的态度,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引为借鉴。

注释:

①② 大庭脩:《江戸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昭和56年日文版,第12、210页。

③ 绪方惟精:《日本汉文学史》,台湾“正中文艺丛书”本,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19页。

④⑤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6页。

⑥ 《宪法十七条》引语均见《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3),岩波书店昭和49年日文版,第183~185页。

⑦ 参《日本思想大系》(28),岩波书店1975年日文版。

⑧⑨⑩ 参杉原四郎、长幸男编:《日本经济思想史读本》,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54年日文版,第45、48页。

⑪⑫ 参廖庆洲:《日本企管的儒家精神》,台北经济日报社1984年版,第36、96页。

⑬⑭ 《孟子·滕文公上》。

⑮ 《孟子·离娄上》。

⑯ 参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2页。

⑰ 《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六,《日本思想大系》(28),第233页。

⑱ 参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2页。

⑲⑳ 参山崎益吉:《日本经济思想史》,高文堂出版社昭和56年日文版,第186、53、42页。

㉑ 中江藤树:《藤树先生精言》,参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81页。

㉒ 《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㉓②④ 《徂徕集·赠长大夫右田君》、《政谈》卷一,《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书店1973年日文版,第497、499、280页。

㉔ 《二官翁夜话》卷五,《日本思想大系》(52),岩波书店1973年日文版,第223页。

㉕ 《荀子·王制》。

㉖ 参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著:《日本心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

㉗ 参李飞、周克西编著:《〈三国演义〉与经营管理》,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㉘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昭和58年日文版,第6页。

(责任编辑 傅殷才)